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 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

Addressing China-U.S. Strategic Distrust

王缉思 李侃如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 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

Addressing China - U.S. Strategic Distrust

王缉思 李侃如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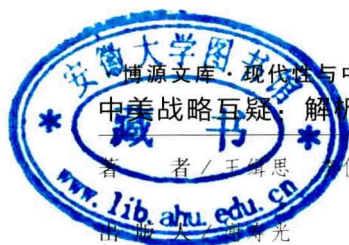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王缉思，李侃如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ISBN 978-7-5097-4628-8

I. ①中…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中美关系—  
研究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520号



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

著者 / 王缉思 李侃如

出版人 / 曹奇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宋超 郭烁  
于冲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文明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阳

经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张 / 10.4

版次 / 2013年6月第1版 字数 / 138千字

印次 /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097-4628-8

定价 / 2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编者的话

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 160 年。在这 160 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 20 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思·韦伯在 100 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 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丛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 30 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则旨在集近 30 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寻求社会共识，是博源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而《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就是上述研究和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面对世界难局，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这就形成了丛书的如下主题：现代性从何而来？中国是如何遭遇现代性的？当前中国为什么要提现代性转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状况及其约束条件是什么？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是否还是一项绝对价值？是否存在“另类现代性”？各类国家现代性转型比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等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相关学科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先后组织了不同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深入讨论；伴随着每一次讨论，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直接拷问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实际上，这些学术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丛书的边界，是不同学科对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想认知、碰撞与交融，从而使丛书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让大家发抒各自的专业研究成果与识见，以期从不同角度勾勒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基本轮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系博源基金会之“博源文库”的一个系列。本套丛书总序由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撰写。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09年9月30日

# 总序

金耀基

博源基金会是由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倡议成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 100 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为此，博源基金会在 2008 年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课题的基础上，于 2009 年 3 月的理事会上又提出了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的构思，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社会共识，应该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

作之一。”

我很认同博源基金会诸君的看法与价值理念。百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国族求生存、发展而起的各种变革运动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包括清代“废科举，设学校”），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1年国民党共和革命，1949年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一直到1978年开放改革所展开的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这一连串的变革运动背后，确有一股强烈的动力，那就是求国家之富强，求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但无可讳言，这一连串变革运动，不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都在向“现代的西方”借鉴学习，向西方取经（应指出，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它是“反西方的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到启蒙的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都一一进入中国。故百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百年来一系列变革运动实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中国现代化。整体上，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过程，即是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亦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的富强（经济现代化是而且仅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一个主要以儒学三纲六纪为规范的帝国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意涵实远不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也不仅是像美国反殖民的独立革命，还是涉

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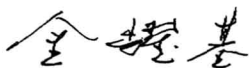
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脱亚入欧，可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值得特别指出者，日本的现代性之建立虽是以西方为范本，但是仍有强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故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日本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共相”，也有“异相”。无可否认，欧洲依启蒙运动建构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性的最早的个案。19世纪以后，欧洲一直被视为世界先进的文明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而转为资本主义“自由之堡垒”，亦自然而成为“西方现代性”之表率。但不能忘记，1917年俄国共产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已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另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已形成一个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力量。以俄国为领袖的苏维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构成了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两大阵营。依马克思原本的理论讲，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曰“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是以拥有更优越的制度、价值的文明性向世界宣称的。诚然，社会主义所描绘之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是无比浪漫动人的。恰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资本主义的也更大。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出现问题或异化，而“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冒进路线，更把中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幸因1978年的开放、改革而转危为机。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不啻宣告



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顿挫。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他说那些可以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方案，已经彻底穷尽了，他说世界可能已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得到了普遍化，成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诚然，福山的论断具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性，须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失败”而理所当然地取得终极的正当性。其实，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美国先后涉足与发动的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以维护自由与民主自居，却充分显露了霸道的政治性格，实不足以言为缔造全球政治秩序提供了范本。2008年10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其殃源正在美国的华尔街，更透显了资本主义之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现代性论辩”，西方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诚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的遗产，不是理性（Reason）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它不能导向启蒙思想家的希望（即普世的自由）的实现，而提出“铁箍”的警告。80年代的“现代性论辩”，循韦伯之思维，集中地表现为“理性的论辩”。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以济工具理性的不足，他是西方现代性的维护者，但他承认启蒙方案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可见到的是，西方的现代性依然在自身反思中逐步修正。我同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的看法，现代性方案是“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中国于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的废墟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发出改革开放的巨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力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过去有人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现今看来，应该是“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了。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史无前见的成就。中国的崛起已是世界的事实。的确，中国扭转了16世纪以来西方日踞世界支配性地位的格局，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很大程度上已实现百年来追求的富强之梦。但是，我们要问，中国上升之路会一帆风顺吗？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在21世纪步向强国之路上，将无可避免地面临种种外在与内在的挑战与考验。在今日全球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只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它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愿景，如前所述，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我们今天距离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建立还很远，即使就中国今天最有成就的经济领域而言，贫富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落差，市场规范的缺失，实在还未能完成一个经济的文明秩序。我们上面已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中，但社会转型并不会自动地成功地转向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项巨大的文明转型的工程，它建构的主要资源来自社会主义，来自资本主义，也应该并必然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所建构的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一点不夸张，它需要这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当代的知识人，以理性、批判的反思精神，贡献各自的心力与智力，来与国人共谱中国的历史新篇章。

博源基金会，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并志在为知识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这个《现代性与社会转型丛书》正有幸得到多位知识界杰出学者的参与支持，各自独立地发抒其专业的研究成果与识见，欣赏敬佩之余，是为序。



2009年7月

## 内容提要

本报告中提到的“战略互疑”，是指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2012年2月15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的主要政策演说中指出，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北京和华盛顿均寻求建立一种长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此外，中美关系是成熟的。双方能够了解彼此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进行广泛的交流。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相对频繁，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60多场政府间对话。但以往的交流经验和广泛的交流活动，却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重。不信任本身即具有缓慢的破坏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会加剧不信任。由于缺乏信任，双方领导人很难确定是否已经了解对方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本报告的两位作者阐明了两国领导层对另一方深刻的关切是什么，并揭示了产生这些关切的原因何

在。两位作者各自叙述了本国政府的观点，并且没有对对方的文字做任何修改。两位作者共同撰写后续的分析和建议。本报告的重点不在于说明双方在日常事务的各种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愿，而是在于集中分析一方对另一方的长远意图产生疑虑的因素。

叙述战略互疑的目的是，希望两个国家的领导层能够更好地揣度对方的想法，并据此确定更为有效的途径来建立战略互信。作者希望本报告能够有助于提高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长期正常大国关系的可能性，而不是因战略互疑形成敌对的关系。

#### 理解战略互疑：美方观点

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并不是美国政府决策者当前的主流观点。相反，他们相信与崛起的中国建立一种基本的建设性长期关系，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但美国的决策者也认为，中国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并据此产生担心，引发辩论，探讨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有效地促使中国行为更加符合他们的愿望。美国领导人关切的基本问题如下。

各种消息来源表明，中国方面认为，中美关系是长期的零和博弈。这就要求美国准备捍卫自己的利益，防备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它可能会做出试图削弱美国的举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希望控制邻近海域（“近海”）的强烈愿望，可能对美国自由出入公海并在其中自由行动提出挑战。而这种自由，对美国实现对其朋友和盟国的承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亚洲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国而言，如约继续履行其对该地区内朋友和盟国的承诺变得更

为重要了。

从经济上看，美国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将有损美国经济复苏的机会。源自中国的网络黑客窃取了美国商业秘密和技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关切。

中国的一党执政制度也从不同角度引发了不信任。美国人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之间理所当然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而集权的政治制度本质上不太稳定，更容易把其国内的不满归咎于他国。集权制度本质上不够透明，这使其他人更难以判断他们是否具有诚意，以及其真实的意图是什么。美国人认为，中国存在侵犯人权（尤其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使美国更难采取行动设法建立更深层的互信。

尽管美国欢迎一个更加富裕、更多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但是它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在全球规则方面应给予特殊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华盛顿希望，北京能够担负起主要大国应该承担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些责任；当北京拒绝依此行事时，它就感到担忧。

美国认为，对于未来美国的利益来说，亚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因此，美国领导人对那些表明中国可能对该地区行使更多霸权的做法特别敏感。华盛顿在中国2010~2012年的行动中看到了类似迹象。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可能直接损害美国经济成本的政策尤为敏感。其中，包括盗窃知识产权，把人民币价格控制在低于市场水平，对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以及中国在2010~2011年对稀土金属出口的限制（此举看起来有获取敏感的外国

技术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

最近的事态发展，增加了美国相关机构对中方的猜疑。美国军方认为，解放军看来在优先发展特别针对美国作战平台的武器系统，担心中国军方在军事计划和理论方面缺乏透明度。来自中国境内的对美国政府、军事和私营部门进行的网络攻击，范围广泛，且持续不断。这让主管网络安全的美国官员颇为震惊，并对中国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提出了严重关切。美国情报官员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北京在思考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更多的是从零和角度出发，而中国在美的间谍活动不断增加。

#### 理解战略互疑：中方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美关系中，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现出实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愿望。北京意识到，中美合作必须基于战略互信。与此同时，在北京看来，正是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状况。

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深深植根于历史。反映近年来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变化的四种中方观点，则导致了这种疑虑的加深：中国地位上升，自2008年以来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国之列；尽管美国目前仍具有雄厚的实力，但是正在走下坡路；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新兴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挑战西方主导地位，并且也在加强彼此之间以及与合作；中国的发展模式——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对社会和经济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西方

民主及其市场经济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供借鉴的选择。所有这些看法结合在一起，让中国的许多政治精英认为，是美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他们相信，鉴于此，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并由此得出结论：美国将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

美国促进民主的话题，被中国理解为是图谋破坏共产党的领导。因此，领导层努力抵制美国意识形态、美国关于民主人权的观念及相关问题的影响。针对中国人眼中美国分裂和削弱中国的图谋，中国正在建设日益强大而精巧的政治和技术手段，以维护国内稳定。

尽管海峡两岸关系有了大幅改善，但是美国仍然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在中国沿海进行抵近侦察活动。这加深了北京对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华盛顿最近对亚洲政策的“再平衡”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威胁感。美国对朝鲜、伊朗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立场使中国感到不安，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

另外，中国认为，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优势，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

中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伊朗、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国际政策和行动进行的批评和抵制，反映出中国的疑虑。即这些政策和行动，是建立在不公正的、狭隘的美国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并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利益。



## 分析

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有三个主要来源：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第一个来源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更为实际的做法是，华盛顿和北京应该解析和处理产生战略互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来源，通过改善彼此对对方国家国内形势的认识，更加有效地开展双边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战略互疑在北京的感受程度要比华盛顿更深，这可能是出于中国对“百年屈辱史”的记忆，以及对同美国相比中国在实力地位上处于弱勢的认知。

### 建立战略互信的建议

以下建议旨在举例说明可能用哪些类型的新举措来应对战略互疑问题。不必把它们理解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连本报告的两位作者也不是对每一个细节都达成了一致意见。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激发双方提出一些创造性想法。

经济和贸易方面：创造条件鼓励中国对美国实物资产进行投资；在2012年美国大选之前，完成目前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评估；中方可以对美国主要官员和分析家增加关于中国政治体系具体运作方式的透明度，使他们能够形成对中国更切合实际的预期。美国和中国也应该尽快完成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

军事方面：开展长期的深层次对话，讨论双方应